

體而扎實的研究基礎上，將自己所考察的華北社會，與已經積累了豐富研究成果的華南、徽州地區進行了頗具啟發性的比較。杜正貞力圖回答的問題是：「為什麼跟『宗族』佔據主要地位的華南和徽州地區相比，華北地區更加常見的是『村社』」。她認為族產的缺乏，以及人口流動性大的特點，使宗族無法在北方發展。而與宗族相比，「社」在華北地區的歷史更為久遠，且在地方社會持續發揮作用，加之朝廷更替、民族征伐的影響，適逢特定的歷史情境，以「地緣關係」為中心的「社」最終被歷史所選擇，發揮了與宗族類似的社會整合功能。

令人稍感遺憾的是，不知是出於何種原因，全書沒有出現一幅地圖。地圖可以幫助我們更加直觀地了解歷史人物活動的特定地理空間，地圖的缺乏給讀者理解本書帶來了些許的不便。若日後能夠有所增補，此書會顯得更加完整。

田宓

內蒙古大學蒙古學學院內蒙古近現代史研究所

王健，《利害相關：明清以來江南蘇松地區民間信仰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278頁。

《利害相關》一書，共分為：「緒論」、「神·廟·人：民間信仰與日常生活」、「廟界：民間信仰的空間展開」、「理念與實踐：士紳、家族與民間信仰」、「信與不信之間：圍繞神靈的博弈」、「承繼與變遷：明清以來松江府及附近地區的楊老爺信仰研究」、「結語」等七個板塊，並附上了部份碑刻內容、訪談記錄及市鎮、廟宇、村莊分佈圖表。著作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對明清時期蘇松地區的民間信仰及與之相關的社會經濟問題進行了綜合、全面的考察，還對先行研究（以濱島敦俊的研究為主，其成果集中體現在《總管信仰——近世江南農村社會と民間信仰》，東京：研文出版，2001；中文版為，朱海濱譯，《明清江南農村社會與民間信仰》，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做出了補充和修正。就整體而言，全書資料翔實、細膩、生動，描繪了江南地區社會生活場景的鮮活畫面，發掘出過去沒有被研究者所注意的大量細節，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

雖然作者所關注的是明清蘇松地區的民間信仰，但在「緒論」中，其對

民間信仰史的先行研究整理，卻是站在全國的角度進行總結、歸納的。構成這部份內容的基礎，是一篇數年前已發表過的學術評述，該文幾無遺漏地網羅了國內外中國民間信仰史研究的主要成果，並作了客觀、如實的介紹、評價，已被國內廣大研究者所引用，成為民間信仰研究入門者的指南。因此，這部份內容的學術貢獻實際上已被廣泛證實。在充分了解民間信仰史相關成果的基礎上，作者對自己的研究對象、時間、空間作了精確的界定，然後介紹自己的研究方法及資料來源等，讓讀者清晰地看到課題的來龍去脈。

第一章對民間信仰與民眾生活的關係進行了全方位的描述、總結。該章先是對蘇松地區的神靈信仰進行了分類，然後分析了祠廟的產權、收入以及與僧俗之間的關係，並分別對與信仰活動密切相關的利益羣體（巫覡、會首與衙役、婦女）進行了考察，最後對民間信仰活動與地方經濟、社會空間的拓展方面進行了具體的例證。

第二章則對民間祠廟與地理、社會空間的關係進行了探索。眾所周知，地方祠廟都有其相應的管轄（服務）範圍，大體上相當於臺灣學者所使用的祭祀圈概念。在江南地區，這樣的空間範圍在史料上通常被記載為「境」（廟界）。對於江南土地廟與境的關係，著名學者濱島敦俊曾以自己的實地調查為基礎，並結合明清鄉鎮志的記載，對土地廟祭祀範圍、市鎮城隍廟的社會地理空間，作出了實證性的探討，並提出以土地廟信仰為基礎的社會空間，是中國基層社區的基礎，即歷代中國的基層社區（如明代的里甲制、清代保甲制）就是建立在土地廟社區的基礎上的。在這一章中，王健對濱島未予闡明的部份作出了補充，還對濱島敦俊提出的江南高鄉地區與低鄉地區的廟界區別（高鄉以「圖分」、低鄉以聚落為基礎）進行了辯證（指出並非如濱島所說的那樣涇渭分明），同時指出鄉村土地神與市鎮城隍神並非總是「從屬的關係」，也有不少市鎮城隍與鄉村土地神地位相並列的情況。廟界之間的關係並非一成不變的，有因地域經濟格局發生變化而產生廟界重構情況的存在。

第三章分別就士紳、地方家族對民間信仰的態度及其實踐活動進行了考察。相對而言，學術界有關這些問題的成果已經較多，因而新穎的內容相對較少。但由於作者所舉的事例均是當時當地的，在士紳數量佔有較大比例的江南地區，這一課題事實上也成為研究江南地域社會所面臨的棘手問題。

第四章對官方政策取向與民間社會的祭祀實踐問題進行了踏踏實實的考察，並以常熟的周孝子信仰為例，揭示了官方的價值取向與民間社會實踐的差距所在，同時還對明清時期蘇松地區官府毀淫祠活動進行了量化分析，並

詳細地羅列出作者所能搜集到的所有事例。

第五章則以個案的方式，揭示了明清五百多年間神靈信仰變遷與蘇松社會經濟變遷之間的關係。與通常的人類學、社會學相比，歷史學由於運用不同時代的具體資料，放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進行如實、客觀的考察，因而其對社會事相的觀察，往往會比社會學、人類學深刻。該章基本上運用歷史學的考證手法，揭示了明末清初松江府及附近地區楊老爺信仰興起的社會與經濟基礎，指出里書、糧長、中小地主、地方官員是其信仰繁盛的重要推手。另外，他還對該神的人物原型進行了一番考證，指出這一民間神靈實際上是道教神靈在地方社會中的民間化。同時作者發現，隨着康熙年間賦役制度的改革，該神原有的信仰基礎不復存在，於是出現了短暫的沉寂期。但在不久以後又得到了復興，其重要的緣由，是由於楊氏家族興起，該神被牽合為楊氏的祖先，出現了楊老爺領導漁民的傳說，廣佈於江南各地的漁民，也成為楊老爺信仰的新興支持力量。

結語部份則對明清時期蘇松地區民間信仰的生態（官方政策、儒家觀念、民俗、社會經濟成長等）進行了提綱挈領式的總括，指出任何因素都不可能單獨發揮作用，而是呈現出一種互相纏綿複雜的狀態，就是在這樣的歷史、社會條件下，民間信仰才呈現了一種常態的特徵，成為民眾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份。

在中國大陸，包含民間信仰在內的區域社會史研究以福建、廣東開展較早，成果較豐，湧現了陳支平、鄭振滿、陳春聲、劉志偉、林國平等著名歷史學者。宋代以來江南地區就已成長為中國經濟、文化最為發達的地區，同時也是民間信仰活動最為繁盛的地區之一。該地留存下來的傳統典籍文獻領先於全國其他地區，對這裡的文獻進行充分發掘、分析，對傳統民間信仰的研究將會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前輩學者濱島敦俊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就充分利用江南地區的歷史文獻，並在太湖流域開展了長達二十多年的實地社會調查，對江南地區民間信仰的形成、發展與社會經濟、國家政治、巫師之間關係進行了富有創造性的探索，迄今為止仍然具有指導性的意義。王健的最新研究成果，則是在濱島敦俊等學者的成果基礎上，把自己的研究範圍縮小到江南的蘇松地區，時限也以明末至清末為主，因而他對鄉鎮志、文集資料的搜求上也做得更為精細、出色，糾正了先行研究的某些誤區，並搜括出一些不為世人所知的細節、事實，讓我們看到，江南地區的民間信仰研究實際上比福建、廣東擁有更好的條件，有着廣闊的發展前景。進入21世紀後，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超越了傳統的珠三角、閩南地區，地方政府對民間信仰的

控制也日漸從「嚴禁」到適當「管理」轉變。根據筆者最近十多年來的研究及調查經驗，傳統民間信仰的復興在該地已經勢不可擋，這就為學者調查、了解歷史上民間信仰活動提供了良好的田野舞臺。利用江南地區豐富的傳統文獻，並結合自己的田野調查，我相信江南地區的民間信仰研究成果在品質上超越華南地區是完全有可能的，有關這一點，我在王健的力作中清晰地感受到了。

當然任何一本著作，特別是富有創見性的著作，都不可避免地帶有這樣或那樣的缺點。該書的細膩、資料翔實不容置疑，但作為更高的要求，我覺得書中部份內容仍顯得有點意猶未盡，匆忙結束。另外，本書也存在一些編輯上的錯誤，直接影響了讀者的好感。至於其他方面的不足，我想各位讀者見仁見智，想必會有不同的意見。但無論如何，誰也無法否認，這是一本出色的區域社會史著作，充分體現了作者所下的苦功，對濱島敦俊《明清江南農村社會與民間信仰》一書的成果也作出了一些有益的修正、補充。

朱海濱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

于志嘉，《衛所、軍戶與軍役：以明清江西地區為中心的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387頁。

衛所是明代軍事制度的基幹。朱元璋在開國之初，即模仿元制，在其控制的地方設置軍衛、千戶所，以此來防守城池。而後，隨着政權的穩定，朱元璋對各地軍衛加以調整，逐漸建立起一套相對完整的衛所軍政體系。以往，衛所制度的研究多被納入軍制史的範疇，以屯田和軍戶的研究為主體，多有宏觀的架構，但對衛所制度本身及其在不同區域中的存在實態，則未能有更詳實的討論。20世紀80年代以後，于志嘉異軍突起，其論著《明代軍戶世襲制度》（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以及〈試論族譜中所見的明代軍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7本第4分（1986年12月），頁635-667）、〈試論明代衛軍原籍與衛所分配的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0本第2分（1989年6月），頁367-450）等，通過對各類史料進行扎實細緻的考訂辨析，修正以往學界對衛所制度的諸多通論性誤解，增強了對明代衛所人戶管理制度和觀念的演變、軍戶在社會中存